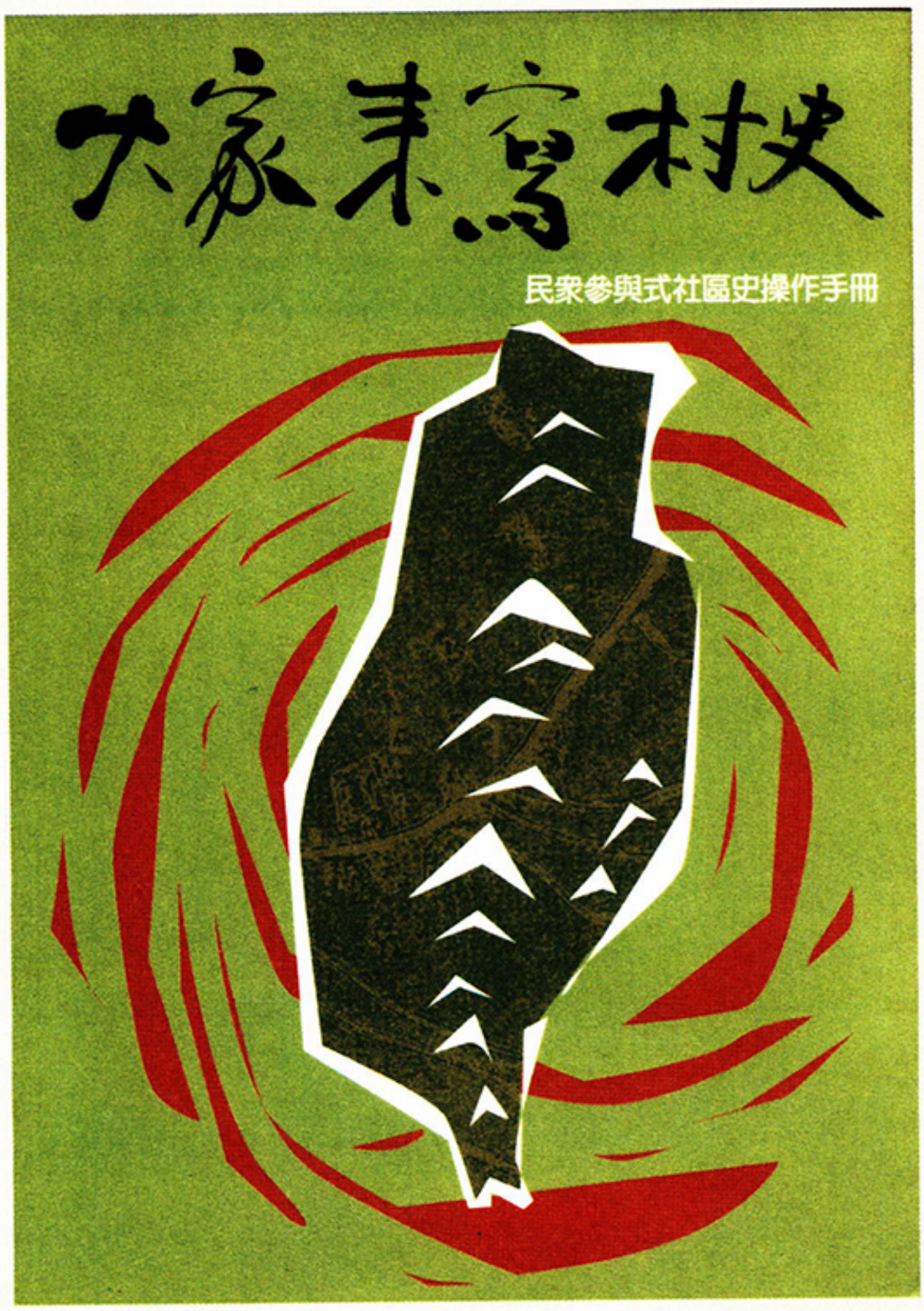
地方文史工作與社區營造

——從「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出發的文史搜索運動[1]

陳　板*



地方文史工作與社區營造—從「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出發的文史搜索運動

摘要

本文嘗試討論地方文史（與地方文獻）工作與社區營造（社區總體營造）相結合的成果與未來性。「大家來寫村史」計畫（計畫主持人吳密察）是文建會中部辦公室（前省文化處）在1998年4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補助的「參與式社區史書寫計畫」[2]，前後一年多的操作過程中，十個種籽村操作出各自的模式，不但發展出不同於以往的歷史寫作方式，也擴展了文史資料（地方文獻）的範疇與意義。整體而言，每個種籽村對地方文史（或地方文獻）的詮釋各有異趣，而「社區營造」隱約才是十個種籽村共同的操作目標，而地方文史則在操作過程既是基礎也是啟動力，在結果的呈現上，地方文史也具有階段性的學術價值。

在大家來寫村史計畫的執行過程，參與計畫的十個種籽村經過了一個參與式的操作工作坊，腦力激盪出幾個切入村史操作的方式（口述歷史、地景踏勘導覽、文化地圖、村史博物館的設置、家族收藏展的舉辦、傳統產業操作、影像蒐集、紀錄片拍攝與製作、邵族正名運動、社區劇場、眷村改建記事、工作坊與村史記者等），最後也用這些手法進入社區（村落、部落），成為相當多元的文史社區營造操作模式。

此外，本文也嘗試檢討社區總體營造操作多年之後，全國各地地方文史運動所扮演的腳色以及其貢獻。從地方文史的挖掘與認識開始，社區的重建運動產生了程度不同的認同作用，漸漸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台灣模式，鄉土的重建運動也從學者專家的個人鑽研，發展到社區的自我挖掘，社區成員的文史工作化，一方面讓文史的意義獲得前所未有的擴散作用，另一方面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史（文獻）蒐集風潮。

*陳板　第三工作室負責人

1 本文發表在2002年10月16日（星期三）～10月18日（星期五）「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台北市：國家圖書館）。

2 陳板主編，《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操作手冊》，（台北市：唐山出版社、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1998年12月初板/2001年6月修訂再板。

關鍵詞

社區文史、地方文獻、社區（總體）營造、參與式村史寫作計畫、村史運動

楔子：八斗子小孩進城，一個在總統府廣場發生的小故事

從2001年4月開始的總統府地方文化展，輪到基隆時，在總統府廣場舉辦地方文化園遊會，展出基隆的地方特產、小吃、旅遊資訊，也展出雞籠（基隆）文史協進會蒐集、出版的基隆在地文史資料，還有來自基隆地區的藝術表演。有一胖一瘦兩個銘傳國中的同學，和同學們一起受邀到總統府廣場表演，中場休息時間，越過排隊等待免費品嚐的基隆廟口名產——鼎邊趖，跑到基隆文史協進會八斗子文史工作室擺設的攤位。胖同學驚訝地問瘦同學，「我從來沒在學校看你讀書，為什麼你今天一直要跑來看書？」瘦同學回答，「要看什麼書呀？」我剛好排到了免費又好吃的鼎邊趖，走上前去翻看瘦同學剛放下的書——《探索八斗子》，我問瘦同學是不是八斗子人，他說正是，又問他以前有沒有看過這本書，他說沒有，裡頭也沒有關於他的報導或圖片。或許，只因為他在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場合看到了自己的家鄉之書，就三番兩次秀給自己的好朋友看。

我們也曾在不同的場合做過隨機的舉手調查，在「台灣」已經成為顯學的今天，有多少人買過台灣歷史相關書籍，有多少人在台灣相關書籍中閱讀得到自己的鄉鎮、自己的社區？我們得到的結果和台灣成為顯學的令名截然兩異，大概只有不到5%的比例，有機會在大眾媒體或出版品中閱讀到自己家鄉超過一百個字的報導或介紹。這樣的調查結果真的令人懷疑，台灣史寫的究竟是什麼？或說台灣史究竟為誰而寫？

台灣有沒有歷史？這個問題意識由《台灣通史》的作者連橫先生率先提出來（1920年所寫的自序），雖然他表示「台灣固無史也」的時刻，已經有不少人撰寫過台灣歷史文字或蒐集過相關文獻資料，可是卻欠缺像他自己一樣的在地

人切身認知，他似乎對於清代宦遊者所編纂的方志特別有意見，認為他們所寫的東西是「舊志誤謬，文采不彰，其所記載，僅隸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闕而弗錄，竟以島夷、海寇視之。」不過卻對於當時的統治者－－日本人所撰寫的台灣史志沒有太多意見。閱讀連橫《台灣通史》的確可以感受深刻的漢人中心意識，不過卻是以其自身所屬的福佬族群為中心的漢人主體，對於與他的生命經驗仍有一段距離的原住民與客家人，他似乎就欠缺了切身感。無論如何，連橫的歷史寫作指點出了寫作者的主體性，稱得上是幫台灣歷史找到一個獨立的發言立場。

近年來，地方志書的編纂，如火如荼地進行，從國史以下到省通志、縣市志、鄉鎮市志，幾乎成為各級政府展現政績的文化戰場，而寫作者早已不是宦遊者與外來者，幾乎都是台灣本地的學者專家，照理，應該很能塑造優異的鄉土情感或歷史觀，可是，實際的情況卻顯現了令人擔憂的情境，地方志書雖然多半也能夠掌握到不同層級的地方梗概，但是，卻未因此催化了地方人士對於地方史事的關注，因而造成了台灣人雖然已經書寫了台灣史，可是卻無法領略其價值的尷尬情境。

時至如今，歷史寫作仍然是歷史專業家，這一點並沒有什麼問題。問題還在於連閱讀者都是歷史學習者的功課，沒有成為普遍大眾的共同興趣，這就成為一個相當大的歷史問題了。

社區營造的概念在台灣推動以來，地方文史工作成為社區營造的重點工作之一，或者說被當作最根本的切入點，然而，為什麼地方文史會獨領風騷，成為社區營造（運動）的重點課題呢？

一、前言：地方文史工作的意義

過去的文史教育方式長期以秋海棠版圖的中華民國當成台灣人反攻復國的領土，等於是把切身的台灣當邊陲，卻把遙遠的中國當中心。鄉土，在1987年解除戒嚴令之前，一直是百姓無法暢談真愛的禁忌，土地與人民之間被政治力所隔絕，因此，社區生活無法找到在地的凝聚力，成為只能往外謀求可能性的空洞場所。

解嚴，從政治開始，漸漸來到文化。地方文史重建運動在解嚴後，從個人的行動、私家的興趣漸漸匯成滾滾洪流，全國各地的文化搶救、古蹟維護、老樹保護、環境保育與弱勢關懷（如原住民、客家甚至眷村），橫向串聯了全國各地的文史、環保、社運，甚至政治工作者。剛開始從家鄉的保護開始，漸漸發覺只有從更深層的歷史文化著手（紮根）家鄉才有長遠的未來。有一度，文史工作者與環保、社運、政治工作者被視為棘手的人物，似乎到處找政府的麻煩、挑社區的毛病、挑戰既有的社會認知，因此讓公部門與企業界避之唯恐不及。

直到1994年，文建會首度以公部門的身分，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也正式賦予地方文史工作正面的形象。地方文史一下子就成為社會的良心，必須擔負社區重建的重責大任。經過多年的嘗試、挫敗與思索，漸漸摸索一條極為特殊的社區營造方式－－從地方文史切入。

在現實之外的寶藏

地方文史工作成為熱門的火紅事業，可以說是台灣經濟奇蹟中的台灣奇蹟。

雖然台灣社會的經濟發展壓力相當大，可是總數已經超過兩千個單位的「地方文史工作單位」（廣義的文史工作室包含文史、鄉土研究、社區營造、環保、文藝等個人與團體；狹義的文史工作室也有超過五百個單位），卻像飛蛾撲火般，無視現實經濟之壓力從事地方文史工作。純從經濟與政治的角度觀看（這也

是絕大多數人對於文史工作者的觀點），文史工作乃是一個緩不濟急的慢功夫。然而，從解嚴之後到現在的十多年來，不只是這群飛蛾撲火般的文史工作者已經品嚐到了現實的回報，連現實的要命的商業經營機制都已發現了文史工作的後勁價值。

在此，我無意強調地方文史在現實上的利益，而想從過去的經驗中爬梳地方文史在社區之中的非現實價值。地方文史，從某個角度來看，就是地方人生活的方式、態度、理念與其軌跡，原本並無法作為現實生存的依據，在過去的歷史思索中，歷史如果要談功能，所謂的「以史為鑑」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把歷史的經驗當成在位者治理國家（或地方）的鏡子，《資治通鑑》就直接把歷史的意義彰顯在書名上。

換句話說，歷史通常是一種事後聰明的追述，勉強只能拿來當作未來施政的參考案例。雖然有一句「歷史重演」的成語，但是，歷史從未真正重演，歷史要不是直線進行，就是朝著多元的方向進行，或者根本就斷斷續續毫無張法地進行。

準此，地方文史究竟在非現實的價值是什麼呢？或說，究竟是什麼因素吸引了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投入呢？

把非現實（的地方文史）當成現實（的產業）來經營，或許是從解嚴以來台灣文史工作者的自我期許，或許也是一種奇特的時代宿命。反而，最現實的經濟條件向來沒有成為地方文史工作者畏懼的課題，與其說他們想從地方文史的投注賺取經濟收入，不如說是從中找尋自我的價值。

社區營造和地方文史工作之間交互運動，吸引了愈來愈多的人投入，形成了台灣前所未見的，地方文史工作市場，是一個有愈來愈多人投入但是回收緩慢的超現實「市場」。

文化與生活的軌跡

地方文史（或地方文獻）從社區營造的角度來看，不只是純粹的文獻史料，

而是一種文化與生活的軌跡，而且，還是一種正在發生、正在演變的鮮活歷史。絕大部分文史工作者在從事地方文史工作之前（或同時）就已經充分瞭解，這種工作具有無法定位的多元性以及不確定性，因此，也具有充分的參與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台灣文史工作者可以說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史（文獻）蒐集方式。

把社區的生活細節透過社區營造的操作手法：一點一滴地挖掘自身的生活資產，也開始重新認識到自身環境的點滴價值。社區總體營造在台灣推動之後，漸漸形成一種社區資源的調查方式，經過幾年的操作之後幾乎每個從事社區營造的地方都從事「地、產、人、文、景」（土地、物產、人物、文化和景觀）五大項目的調查。這幾個項目的調查，和地方文史的取向相互為用，在社區之中攪動，形成社區運動的軸心，只要有機會，社區居民就可能（或多或少）參與到資源的調查行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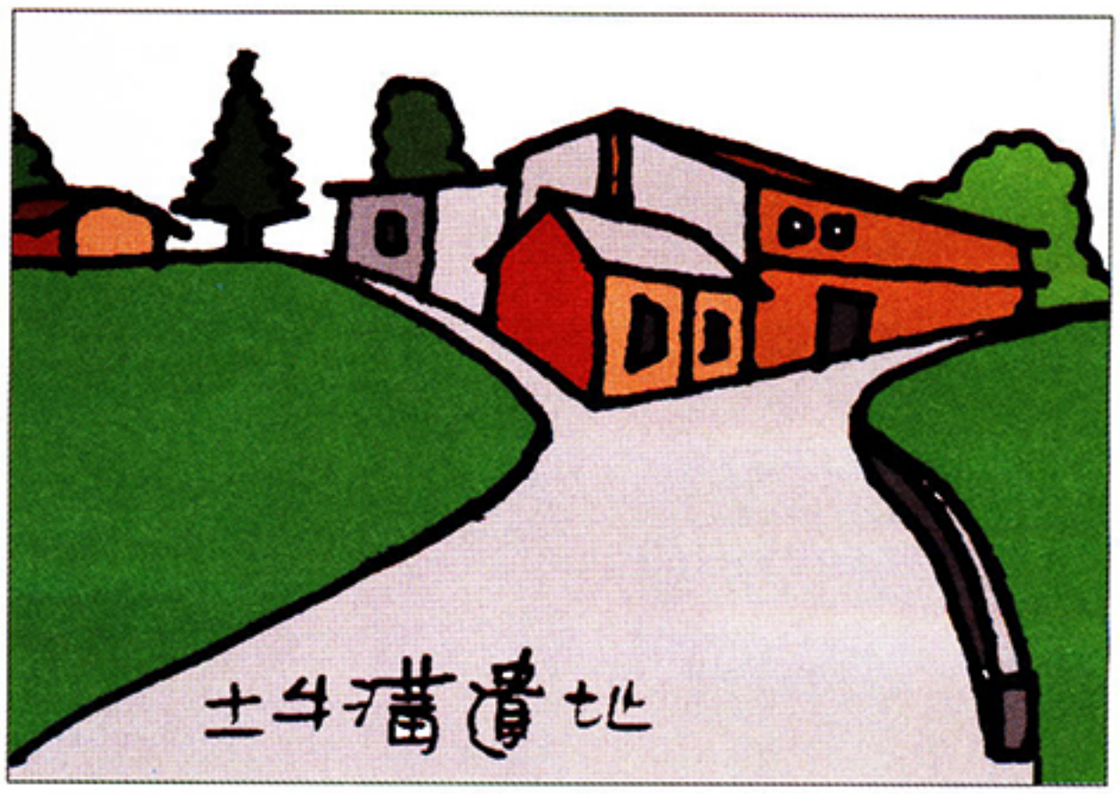
地方文史也在這樣的行動中，漸漸成為回歸常民生活的專業措詞，既專業又常民。

社區營造的原動力

社區營造也非易事。過去從硬體工程切入的社區營造概念漸漸受到挑戰，硬體的投注與社區是否獲得重建之間，並未均衡發展。社區的硬體投入若非有良好的事前規劃，以及後續維護機制，幾乎都注定要成為現代廢墟。因此，社區自發性或內造性組織的良窳，也就成為社區營造能不能推得動的根據。

社區文史工作算起來可說是成本最低的社區投資，卻也是社區組織自我成長的最佳切入點。台灣的社區各個都有極其複雜的成因，而且社區居民多半來自不同的背景，單一姓氏或單一行業的傳統社區幾乎要絕跡了，複雜多元的現代社區，組織人群的方式欠缺傳統卻也有一定價值的家族性機制，如何找到內在的動員力，一度是一個棘手的課題，社區文史工作者的理念和社區領導人之間，通常得經過很長時間的相互揣摩，才找得到彼此可以相容的溝通方式。

一旦彼此謀合在一起（也有極少數文史工作者身兼社區領導人），社區的動員就能從複雜的人事溝通轉往土地的集體認同，也才有機會整合祖籍不同、語言兩異、生活習慣甚至風俗信仰都截然不同的新社區（或稱新故鄉），從地方出發的文史工作也就成為社區營造的原動力。



土牛溝遺址：六家庄村史寫作期間重新確認了乾隆26年的歷史遺址。如今已遭高鐵特定區都市計畫摧毀。

二、文史工作室（者）介入社區營造的特質

地方文史與社區營造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有社區並不一定就有地方文史的成果，兩者之間若有關聯必然有一個恰當的中介機制。而在台灣，（地方或社區）文史工作室幾乎就是連結兩者的機制。文史工作室以第三部門的角色，穿梭在公部門與民間社會之間，一方面建立自身的存在基礎，另一方面也在社會（社區、地方）察覺（找尋或挖掘）議題，甚至，進一步成為積極的發言或介入者。

解嚴前後開啟的文史工作，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漸漸發展（展現）出某些特質，尤其在介入社區營造方面，文史工作室漸漸發揮了難以衡量的作用，催促了社區營造的進行也鼓舞了更多社區居民的參與。

細究其故，可以約略歸納出幾個特質，或許，在文獻蒐集與地方文史資料的操作方面，這樣的特質也是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史互動出來的另類動力。

身分的自由度

文史工作者身分十分多樣，從工人、農人、教師、醫師、糕餅師、空間設計者、攝影師、企業負責人到無業者，都可能從自己的本行中變成文史工作者。然而，在此所謂的「身分的自由度」還不單指這種身分（職業）的多樣性，更在於他們出入專業、土地、社會與責任感之間不會畫地自限的自由度。

如果只是一個農人，生命最大的意義除了多生產一點農產品之外，或許還要考慮產銷、經營的問題，至多，也只考慮到人生價值與家庭價值的意義。而身兼著農人身分的文史工作者，可能因此穿透了農業經營的現實性，進入了農業生活的文化與精神層面，甚至能跳開自己的現實利益，從公共的角度考量整體的社會價值。位於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的布農文教基金會，白光勝牧師與那布兩兄弟，從父親的農場出發，經營出一個「文化傳承與經濟生機兼顧的模式」，目前，「布農部落文化體驗園區」已經規劃有部落民宿、部落劇場、有機蔬菜區、生態公園，並持續舉辦藝術展、河川保育營、青少年狩獵營、海內外巡迴演出、戲劇營、兒童編織營、原住民藝術創作研討會，期望藉由有機農業、文化研究、藝術創作、環境保育、生態復育、工藝傳承、青年養成、幼兒教育、老人福利，走向原住民社會發展自主、開創生機的模式[3]。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原住民重建工程，早已經超出農場經營所能想像的一切可能性了。

台灣的各個角落，漸漸因為文史工作者的介入，讓文史思維漸漸在社區之間曝光，因此也漸漸鬆綁了社區的單一思維，不同行業的社區居民，漸漸能夠跳脫自身（單一化）的價值判斷，而形成了從文史思維出發的社區性公共領域。原本毫無現實價值的「文化」與「歷史」，如今竟成為社區意欲超越地方派系等現實利害關係的苦口良藥。舉一個例子，921之後，受損嚴重的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泰雅族麥路豐部落，為了重建以「泰雅爾文史工作室」的名義申請公部門

3 參閱http://www.bunun.org.tw/基金會簡介/index.htm 2002/10/11閱讀。

補助，根據泰雅爾文史工作室負責人陳文雄、陳秀英牧師夫婦的經驗報告，當初他們從事部落再造時，曾經想要透過教會的力量從事學童課後托育安親服務，然而，部落裡頭頗為複雜的教派系統，讓他們的工作困難重重，終於將主辦單位由教會改成以當地族群文化為名義的「泰雅爾文史工作室」，果然順利化解族人的疑慮，他們的經驗認為，文史的力量超越了派系，讓原先的困境因為文史的介入而獲得化解。地方（部落、族群）文史有機會穿越既定的價值判斷（不管是現實的利益還是抽象的派系），提供另類視野。

觀點的多元性

地方文史工作雖然以文化與歷史為名目，然而，實際的操作時卻不僅侷限於文化與歷史。除了文化與歷史之外，舉凡環保、弱勢、鄉土教育（學習）、社區願景等等思維，都有文史工作者的腳印。也因為在操作上的自由度，讓文史工作的思索領域益加擴大、觀點更加多元。

文化與歷史的視野寬廣，讓社區的價值感更加豐富，相對地也回饋到文史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文史不只是單純的文史，政治、社會、經濟與產業，一點一滴都蘊含了文史的價值，或說，因為文史的介入，台灣的社區思維也能在政治、社會與經濟之中涵蓋了容納彼此的包容性。

觀點的多元性讓地方文史工作者不僅注意到地方的開拓史，也漸漸注意到地方的發展史，更注意到地方上不同階層、身分甚至不同行業的歷史。而社區營造的操作經驗，進一步讓歷史寫作（或詮釋）權從歷史專業者解放出來，雖然在技巧上、成熟度上，甚至專業上，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然而，因為參與者的身分多元性加上觀點的豐富性，在文史視野的開拓工程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寬闊領域。

社區的介入性

過去的歷史研究者多半是靜態研究或事後研究，在觀點上也以中立客觀的角色從事專業的研究，強調歷史的事實、考究歷史的真偽。社區營造的歷史文化操作態度反而是一種積極的參與與介入，主觀涉入的概念，表面上看起來頗為違背了歷史的判斷與詮釋，卻是社區營造的基本理念。或許也是這十多年來，經過解嚴以來的政治與社會參與經驗，確認了「參與」的確是社會改造的可能動力，在不太長的歷史發展過程，台灣人有機會看到自身的政經環境的改變，也意識到歷史觀念的扭轉與詮釋，並非遙不可及的事。

社區的介入，點點滴滴的改變也不會那麼隱晦，自己寫歷史的觀念，成為相當有自覺的公民意識。

《美濃鎮志》[4]的寫作，是一個相當值得探究的案例，當初，幾個美濃離鄉青年有鑒於一個國家重大建設－－美濃水庫計畫－－可能會毀損家鄉的自然與文化生態，回鄉從事家鄉文史的寫作與社區動員工作，因勢利導運用多種資源，激發了美濃人的文化與環境自覺意識。幾個年輕人結合了在地的知識分子與地方士紳的能力與影響力，證明美濃的文史與生態價值，遠遠超越了水庫帶給地方的利益。《美濃鎮志》（中研院民族所徐正光所長任召集人）即是由這群年輕人，號召地方人共同書寫的地方志書。這個寫作計畫，和反水庫運動之遊說計畫相輔相成、一體兩面，加上因為鎮志的書寫凝聚了地方的有識之士，組成了「美濃愛鄉協進會」與「八色鳥協會」，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家鄉的營造，一方面呼籲家鄉的美感與價值，一方面也鼓吹水庫帶來的毀滅性危機。經過了美濃人多年的努力與海內外各地的聲援，文史工作成為逆轉國家重大計畫的尖兵。參與式的文史寫作，讓每個美濃人很自然的捲入了家鄉保衛戰，也因此改變了地方的歷史。

4 美濃鎮志編纂委員會，《美濃鎮志》（上、下冊，高雄縣：美濃鎮公所），1996年8月。

體貼的學術研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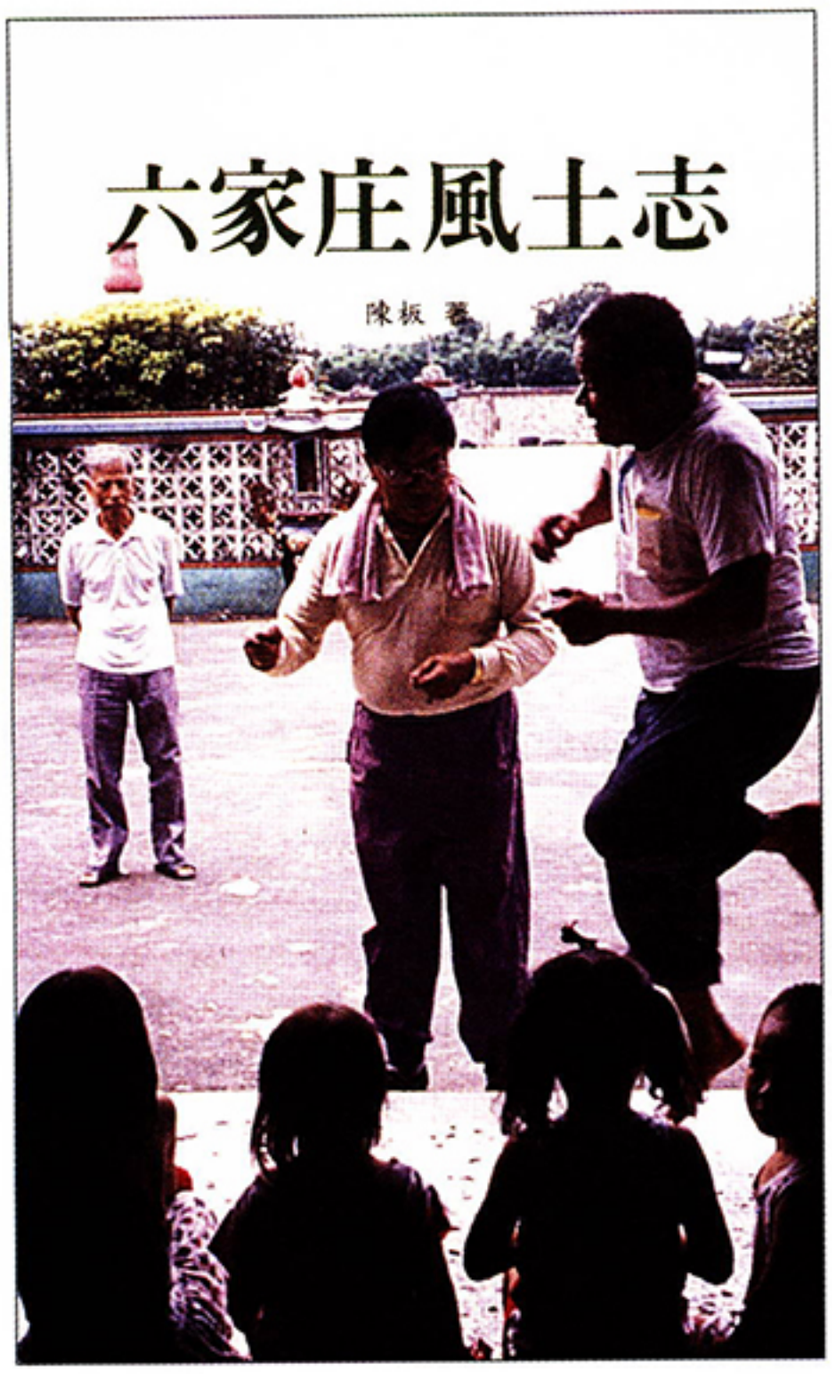
然而，除了少數像《美濃鎮志》這樣的地方志書，絕大多數的地方志書，都從地方首長的政績展現（不只是用鄉鎮市志記錄施政成果，連志書出版的事件也被當作一種政績）出發，雖然其中也不乏擲地有聲之作，可惜，寫作者從傳統的志書撰寫考量，讓少數擲地有聲之作照樣置身圖書館書架，任其蒙塵。

前述，解嚴以來，台灣歷史的相關資訊早已成為顯學，可是台灣歷史的書寫仍多未涉及區域性或地方性的領域，因此，絕大多數閱讀人，仍難在坊間看到（或買到）與自身相關的台灣史書籍。

而文史工作者的撰述，自始至終都緊貼著在地與社區居民。一方面在寫作的內容上多數以社區為主角，企圖鉅細靡遺的記錄、掌握社區的生活實況，也挖掘社區的古往今來，嘗試建構更加完整的社區史；另一方面，文史工作者的寫作多半也以社區居民為對象，寫到社區人都可能夠閱讀的程度。在表現手法上，則盡量掌握深入淺出為原則，用大量的圖片、插繪與文獻史料之旁佐，製造社區居民更容易參與的空間。

相較於政績式地方志書的寫作，在全國各地蓬勃不已的社區書寫（社區史、社區報、村落史志等等），篇幅或小或大，多以貼近社區讀者的閱讀興趣、能力為職志。

以文史介入社區營造，如果無法讓社區居民讀得下去、讀得有興趣，根本無法往下進行。再加上多數文史工作者並沒有太大的公務或升等壓力，因此，也就能夠寫得盡情盡興。因此，文史出版品的可讀性也就相對提高。



《六家庄風土志》封面，六家庄村史寫作之前身。



六家庄新瓦屋花鼓隊，也是從六家庄發展起來的地方獨特民間表演形式。

三、介入與觀察的結合體：從觀察角度的差異看待地方文獻

地方文史工作者也從文獻的對待開始，並不因為寫作者的身分之多樣性，流於社區性的稗官野史，更不可能（當然也不願意）憑空想像、任意捏造。地方文獻也就成為切入地方文史的珍貴資源。然而，地方文史工作者對待地方文獻的態度卻非僅於資料的引用，地方文獻原本就相對的匱乏，尤其台灣過去的歷史經驗中，政權的幾度變革，當然影響到了歷史詮釋的角度，再加上絕大多數地方，文獻史料的以訛傳訛，甚或完全空白，影響到地方文獻的解讀可能。

另一方面，地方文獻也是志書撰寫者的參考依據，少數有心從事地方志書撰

寫的文化人，應當願意重行踏查前人遺留文獻的歷史場景或許也重新定位其歷史意義（楊南郡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著名古道及登山專家，以他的雙腳重新踏查日本人類學前輩，如森丑之助、伊能嘉矩、鳥居龍藏、鹿野忠雄等的著作，發展出很另類的翻譯方式），然而，也有不少地方志書撰寫者心存包攬工程的心態，將寫作視為一種營利方式，既有的地方文獻成為某種程度的「歷史鐵證」，不問撰寫者的寫作初衷，也不管不同主體的思維角度，以直接引用為準則。

相對於此，地方文史工作者對待地方文獻，也就提供一種值得討論的方式。

文史工作室從參與與觀察的兩方面切入

參與觀察，原本為人類學研究進入田野現場，主客觀條件相互運用的調查方式，透過觀察察覺不同文化之異同，經由參與體會到田野對象（或異鄉或同鄉而異文化者）的心理感受。

文史工作室（者）借取參與與觀察的操作方式，卻逆反了人類學家從事以異文化為主軸的操作模式，台灣的文史工作室（者）經過幾年的摸索之後，漸漸以回鄉從事自身的社區文史為首務。進入自家社區的態度當然是一種參與，而且是更為深入的參與行為，而透過跳出式的客觀觀察，又讓在地人重行察覺在地人視而不見的家鄉資產。全國各地不勝枚舉的地方文史工作成果，不斷傳出搶救文化資產、自然資源的訊息，也有愈來愈多過去從未或甚少受重視的在地資產，如老樹、舊屋、廢棄車站、老舊眷村、溼地、荒野等等，這些在以往被當作落伍或蠻荒待墾的場所，其實乃是透過主客觀思維之間互動比較，在既有的社區領域之內發覺出來的「現代資產」。

文史的搜尋與記錄，借取人類學的田野方式，再結合報導文學的體例書寫，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文類。從《人間雜誌》（1985.11至1989.10）以來，關懷底層與弱勢的報導美學，一方面從強烈的影像著手，彰顯議題的深刻性，另一方面也以深度的訪查，引領閱讀者進入往常所忽略的課題，這樣的美學觀已經

普及到文史工作室（者）的文風，大眾媒體鼓吹的報導文學，也在這樣的思維中穩定發展。兼顧內容與文筆的報導文學書寫風格，也就成為地方文史運動的利器。

參與而有共同體的意義

個人的參與，彰顯了某一個特定個體的主觀意識，充分發揮這樣的意識，有助於社區文史深度的挖掘。某一個耆老的生命史，當透過他與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深度互動（訪談、記錄與交叉比對），將能呈顯出這個社區的文史血肉，與以往側重骨幹、講究客觀公正的歷史書寫，有極為鮮明的差異。

然而，只專注於少數個體的參與感，卻只能表現出社區文史的某個側面，無法呈現社區文史之全貌。從事社區營造的文史工作者多半深闇此理，因此，也都會努力建構更多的社區參與樣本，從個體的參與到集體的參與，其實也是社區營造永無止盡的功課。

社區透過文史的集體參與與個別的差異分析，漸漸有機會釐清社區的文史特質。不只是一磚一瓦都重新獲得意義，連人的價值也有機會跳脫面目不清的人頭民主式的模糊意象，每個個體有機會回歸人本的價值。既有個人參與感（到集體參與感）又有共同體的概念，讓地方文史資料的蒐集與記錄工作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觀察而有學術深度的宏觀性

客觀的觀察，對於地方文史工作者而言反而是一項挑戰，如何在習以為常以及人情糾葛的家鄉社區察覺出異鄉性，的確是一大挑戰。在充滿了主觀情緒的家鄉從事田野調查的文史工作者幾乎都有外人難以體會的苦楚，或許，古人所謂的「近鄉情怯」，就包含了這層意義。

對於異鄉人而言，一看就知道的些許差異性，然而，對於在地人卻難以察覺其異同。客觀觀察的態度，基本上是靠著後天的比較學習得來的。旅行的經驗

與異鄉居住的歷練有助於視野的開拓，一方面，因為國內教育的普及，入學管道相對順暢，戰後出生的一代幾乎都有離鄉就學的經歷；另一方面，經過了經濟奇蹟的洗禮，台灣人也具有相當的旅行能力，不管是國內旅遊還是國際旅遊的經驗，或多或少都擴展了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比較性視野。

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觀察基礎也在台灣整體的旅行能力的根基之下，具有相當的優勢。此外，在觀察之餘，地方文史工作者也因地利之便，有機會不斷地就近考掘新資料，在觀點上也時時受到在地居民與相當嚴苛的大眾批判，在在都促使地方文史工作者必須更加深入，掌握更貼近社區價值的文史資訊、建構更具學術價值的文史成果。

四、地方文史資料的範疇

從社區營造的角度，地方文史資料的範疇包羅萬象，其實就是一部社區百科全書的架構。彰化縣溪湖鎮的溪湖文史工作室負責人楊清仁，經過十多年來的努力，從國內外的所有資料庫、圖書館與私人蒐藏，極盡能事地搜羅，把所有關於溪湖鎮的相關資料都與以數位化，其架構就是一部地方百科全書，從總論、自然、考古、住民、政治、經濟到文史相關訊息，不管是圖檔還是古文書，全都輸入了電腦，據說連同圖片、文書計算在內，至少超過三億字的內容。[5]

像這種規模的地方資料庫，並不多見，然而，其搜羅的範疇之寬廣，不但讓人嘆為觀止，也讓人敬佩其能耐，更令人感佩的是，楊清仁先生的專業所學竟非文史，而是電子業。據他所述，他之所以投入這個資料庫的建立，一方面是因為他察覺到台灣資料的匱乏，與自己對家鄉的熱愛，以及，他的數位化的專業能力的掖助。

---

5 參閱http://chifu.tacocity.com.tw/index.htm 2002/10/11閱讀

一個學習電子專業的地方文史工作室，以傳統地方志書的架構為藍本，界定了地方文史的範疇，創造一個地方知識的王國[6]。這個現象，值得進一步探索台灣各地地方文史工作者重建地方知識體系的知識庫範疇。

檔案史料：既有資料

台灣既有的檔案史料，因為文字歷史相對短暫，三四百年來累積起來的總量，分到地方文史的領域裡，幾乎少之又少，除了少數幾個重要的歷史古城之外，很多社區幾乎分不到幾條，不用費多少時光就能窮竟。

可是，除了相關公文書、方志與公私部門出版品之外，還有因為特定政治因素遭受政治羈壓深鎖的檔案史料，如日本時代總督府檔案、政治性的二二八與兩蔣檔案，資料供給不夠普及化的淡新檔案、清史檔案，都阻礙了地方文史工作的推進。

另一方面，仍有許多散落在民間的既有檔案，如私人收藏的契約書、族譜、家譜、個人日記、老舊照片等，近年來還有不少藏家，收集古書、明信片、郵票、郵戳、廣告單、帳單等常民俗物，甚至也有人以特定年代（如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時代用品為蒐集對象，充分掌握了不同時空的物質訊息。

對於文史工作者而言，檔案史料不只侷限於公部門的圖書庫藏之中，還有從人民百姓各行各業出發的庶民文件。著名的文史工作者莊永明先生，從「台灣

6 參閱溪湖文化工作室 階段性目標：
(1) 溪湖文史資料編撰 (沒完沒了的工作)
(2) 開放式活動及展覽空間 (4/1/00完成)
(3) 林蔭行人徒步區 (4/1/00完成)
(4) 城鄉新風貌美化生活 (.ing)
(5) 協辦文化活動 (沒完沒了的工作)
(6)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沒完沒了的工作)
(7) 產業振興方案推行 (沒完沒了的工作)
(8) 防災綠地,休閒公園之推動 (.ing)
(9) 建議地方政府及糖廠結合，推動溪湖觀光小火車及觀光農業知性之旅 (.ing)

的第一」、台灣歌謠、大稻埕的生活面面觀，到早期咖啡廳的點料單等等生活點滴物品，無所不收，成為各出版書店與公私部門找尋常民史料的寶庫。他表示，「我可以說是台灣的『文史攤販』，也未經過嚴謹的文史訓練，能有目前的資料累積完全是一種興趣，比較幸運的是生處於20、30年代的人多有接觸，生活環境週邊也有很多的故事。」[7] 他認為「生活史料」有其重要性，史料就在自己的生活四周，但多半都被忽略了。言下之意，生活史料可說是無所不包了。

無形史料：非文字紀錄

社區營造的工作更加積極，不只前面的所有資料都不願放過，還更進一步開發許多非文字性的無形史料。記憶在頭腦中的史料，經由口述訪談、錄音、錄影、對話、論辯，激發出前所未有的無價史料。

絕大多數的社區文史，其實很難獲得公文書類的記載，地方志書到目前為止也僅止於鄉鎮市志，因此，如果以既存檔案或文獻，就想建構地方文史，無異緣木求魚。各地已經愈來愈蓬勃的口述歷史人才培訓計畫，以及愈來愈多的口述歷史出版品，可以看到即便在古都台南市，如果沒有口述歷史的操作，也無法建立完整的安平人物志。[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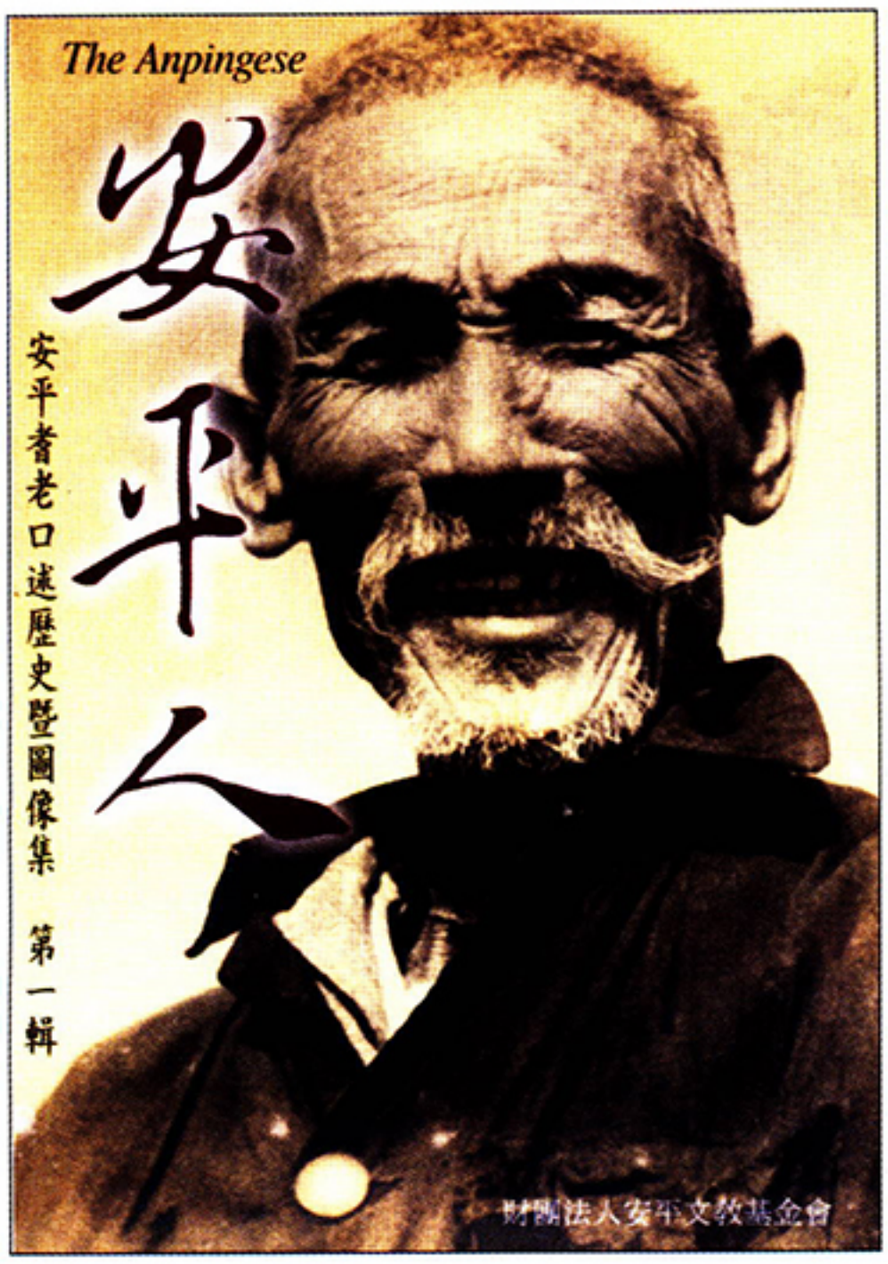
終究，文字的表達方式，僅僅是整個社會不到千分之一的能力。幾乎佔了絕大多數的國民，不用（或不擅長使用）文字表達自身的意欲，更不會表達自身對於公共領域的意見。社區（地方）文史在某個角度來看，就是一種個人將自身的意見表達在公共領域的過程。不管是所見所聞，還是道聽塗說，社區居民的東家長西家短式的街巷評論，也是地方文史工作所要掌握的表現方式。從音

---

7 陳板主編，《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操作手冊》，（台北市：唐山出版社、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1998年12月初板/2001年6月修訂再板。頁144。

8 鄭道聰，《安平人－－安平耆老口述歷史既圖像集》，（台南市：財團法人安平文教基金會），2002年6月。

樂、諺語、俗語、各族群、各地方的在地用語、工人一起用力的節奏樂音等等，都是無形卻有價值的地方文史資料。



《安平人》封面



《竹中鄉土誌》封面：本書乃是金山面文史工作室負責人吳慶杰先生，秉持金山面之文史社區營造經驗，費時一年，回鄉寫作所得的優異成果。

五、文史工作室蒐集地方文史資料的方法

文史工作室的獨特之處，在於古今中外大概都少見這樣的組織，雖然他也被歸屬到NGO或NPO組織之列，然而，這種組織的工作卻和一般的NGO或NPO組織不大相同，他沒有明顯的服務對象，也沒有明確的宗旨目標，與其說是一種社會服務組織不如說是一種自我成長的文史認同感之建構。

在1987年解嚴前，地方文史是幾乎被劃上台獨等號的政治性禁忌。影響所及，鄉土知識一片荒蕪，土地認同感被政治力所左右，把時空都遠離社區的中國領土當成了鄉土，擴大國家版圖被當成是愛鄉愛國的表現（例如保釣事件），

卻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一丁點的社區或學生發言空間。我大二時（1981），擔任學校的書法社長，一個化工系的竹中學長邀集書法社、國畫社與西畫社的社團，希望能發行一份藝術性的學生報刊，然而，在發行之前就被學校的政戰系統攔截下來，不但把每一個社團的社長調去查問，還記了那個學長一個過。我當時只懂得推卸責任，完全不瞭解我的學長做了一件相當了不起的革命。現在回想，還對無法真正參與學長的工作有所遺憾，可是，這個事件也在我的身上切身證明了解嚴之前白色恐怖戒嚴的厲害！

文史工作室在解嚴之後如雨後春筍般萌芽，最初的工作幾乎都在自我學習，學著重新瞭解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土地，台灣研究也就成為顯學。一時之間，只要有一點關於台灣（民俗、鄉土、文學、政治等）的研習營、研討會都能吸引一群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的愛好者。台灣的蕃薯造型甚至直接成為最大在野黨（如今的執政黨）的黨旗，顯然一個解嚴就讓台灣「出頭天了」。文史工作室就在這樣的基礎之下，介入了社會的論戰、批評與地方書寫的媒體運動之中。1987年到1994年，大約七年之間，文史工作室在全國各地發動文化搶救、古蹟搶救、生態救援、原住民、農民、客家文化再造運動，而且，也不分族群、不分地區、不分黨派（基本上以改革者為多）串聯彼此，逐漸形成一個未必然相見，卻透過傳真機、電話、影印機等小眾連結方式，形成了某種文化現象。哪裡有需要救援，只要一呼就有百應。同時，媒體也因報禁解除，擴大了版面，一方面內容需求孔急，另一方面也有所謂的「本土刊物」（如自立晚、早報、台灣時報、民眾日報、首都早報、自由時報，以及創刊不久就可能關門的各種小中刊物，如《新文化》、《南方》、《台灣文藝》、《島嶼邊緣》等雜誌）努力鼓吹剛剛萌芽的文史工作者寫稿、投稿，一時間台灣相關資訊出版市場一片蓬勃。

1994年之後，文建會推出了「社區總體營造」，讓早已在民間形成的內在文史聯結，有機會獲得公部門的認可，甚至獲得公部門的經費支援。有人認為或許會（因為某種程度的「收編」）損壞其運動性，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

，民間文史工作室的運動性依舊可見，短暫的「收編」的討論，並沒有羈絆公部門更加擴大對文史工作室的倚重，民間文史工作室調整腳步之後，有些仍舊堅持不接受公部門的經費繼續在底層操作，有些人則開始介入的公共政策（文史性質）的制定與運作。

既有文獻與田野經驗的比對

某些文史工作室的成果曾被學院裡的專業者批評為「假歷史」；另一方面，常常也可以看到文史工作室在研討會場抱怨，文史工作室的成果，好一點的會被專業的學院研究者「收編」，做壞了的則被批到狗血淋頭，這個現象或許也是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什麼是真歷史、什麼是假歷史？而文史工作者的價值（主體價值）又在哪裡？

貼近社區的臨場感與社區網絡關係的優勢，讓地方文史工作室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田野資料。他們常常因此擔任專業研究者的在地助理或在地資訊提供者的腳色，有時甚至還搖身一變成為報導人。在方法的操練上，學者專家的學術論文無疑也是地方文史工作者模仿的範本之一，尤其文史工作者漸漸有機會受邀發表的田野成果，在寫作的格式上，就有爭議了。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就被譏為「假歷史」呢？或說，究竟有沒有一種合於文史工作者發表論文的文體，還是仍得遵循國際規範，繼續撰寫專研究員眼中的半桶水文體呢？

文史工作室因為貼近社區，又擁有深厚的社區網絡組織，因此，在資料取得上，也就有一定程度的便利性。資料取得之後，又能就地比對田野現場的知識。以澎湖文史工作者采風文史協會為例，在解嚴之前，澎湖研究多為各大學或中研院的學者專家，然而，澎湖研究的成果多半仍屬研究室裡的成就，澎湖人始終無法領略學者專家所做的澎湖研究之價值。解嚴之後，由馬公高中林文鎮老師為首的在地文史工作者組成了澎湖采風文化學會（前身為澎湖采風工作室），從社區文史種子人才的培訓開始，一點一滴地累積了屬於在地文史工作者的澎湖知識，一方面將前人對於澎湖的研究重新品味、重新消化，另一方面也

從在地人的角度嘗試重新觀察、重行記錄，也重行研究。漸漸地，采風與林老師成為各種學者專家接觸或進入澎湖的管道，也成為澎湖學的在地營造者。

北台灣的淡水、九份、大二結、仰山、三峽、三坑子、九讚頭、金山面、北埔、頭份、獅潭到南台灣的美濃、橋仔頭、藍色東港溪、大武山等等（中台灣、東台灣與離島多到不勝枚舉），各地都有地方文史工作室（團隊），擔負著地方文史資源的內外管道，既蒐集資料，又比對田野，甚至進一步擔當在地營造的文史中心。

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史資料的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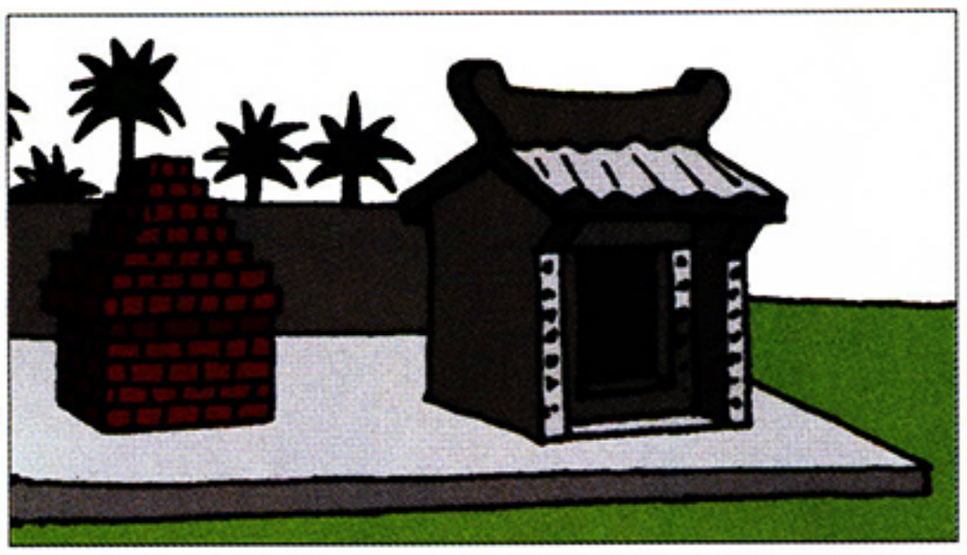
社區營造不只是社區的重建工程，也是一種地方文史的建構場所。前述的各個地方，都有規模不等的文史工作室（組織、團隊），把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史資料的建構當成互為表裡的首要任務。

社區營造蔚為風潮，鼓舞著更多的社區從過去的社區活動中跳脫而出，另一方面國家的社區政策也漸漸的不侷限於以往的內政部系統，在公部門經費的掖助準則上，也有大幅度的調整，讓社區與文化（文史）之間漸漸有機會相容（甚至結合）。如今，幾乎絕大部分的社區營造計畫，不管是文建會本身辦理的案子，還是營建署、衛生署、環保署、農委會、經濟部甚至921重建區，地方文史幾乎都要扮演著相當吃重的角色。如果某一個工程（包含軟硬體），欠缺文史工作的配合，很可能做完之後不只後續維護機制困難重重，連百姓都不能領情。嘉義市中正路二通的造街計畫，因為直接從公部門的工程款獲得資源，太快越過了社區營造的醞釀與商家的街路文史工作，花費大筆經費的新工程，馬上就被居民要求，至少要比照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老街的做法，拆除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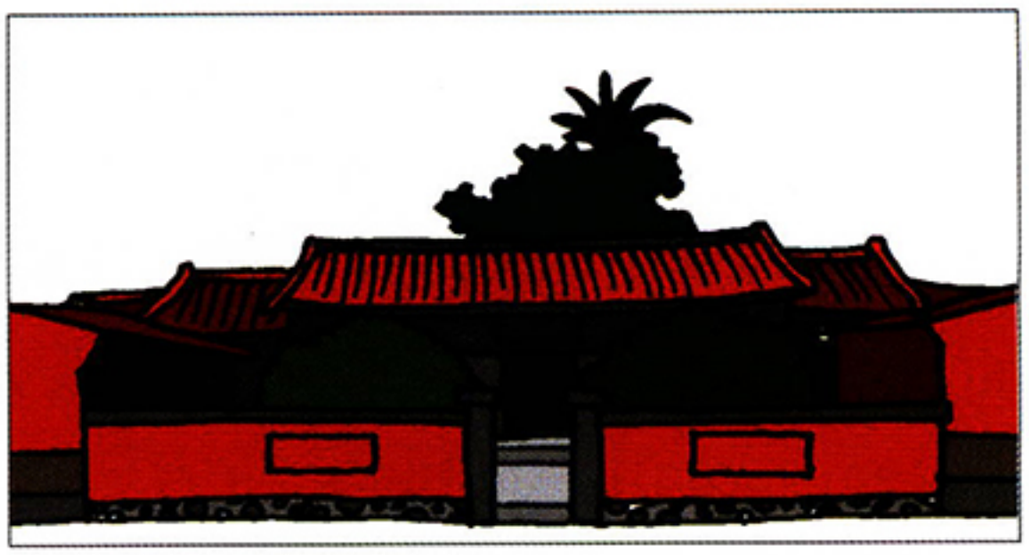
嘉義市社區大學事後進入二通，協助居民從事老商店的口述歷史的訪查，並製作簡單的折頁訊息，花費不到整個工程經費的千分之一，卻讓二通居民感受到社區營造的魅力。主持計畫的蔡美秀教授本身也是老街居民，挑出了六個老店（永昌行、丸茂磅秤、振發行、新源興、金介山蔘藥行、林聰明的沙鍋魚頭

等六家），彼此的互動讓老街裡的老店獲得全新的價值。史料就在操作社區營造的過程，點滴現身，街上即將拆除的變電箱、被機車一下就壓壞的磁磚、十字路口上的不知名圖案，成為政府錯誤施政的標記。

同樣是公部門也有參與「投資」的連江縣馬祖南竿的城鄉改造計畫，因為南竿經營了九年的社區自覺運動，從知識分子的「高談闊論」開始，重新理解了家鄉傳統空間（閩東建築）的價值，嘗試提案保護，進而再利用，民間社會與公部門共同努力用心經營，讓老屋保護重生，成為文史動員的原動力。因為種種的努力，南竿獲得了2002年度營建署評選的「魅力城鄉大獎」的得主。



六家庄高鐵車站特定區內的林屋伯公形象：已遭高鐵都市計畫摧毀。



六家庄東平里之問禮堂林屋：獲得保存的四座客家老屋之一，可惜目前部分的建築構件已遭偷竊。

六、從「大家來寫村史」之社區參與式村史寫作計畫談起

「大家來寫村史」，是前省政府文化處在洪孟啟處長與李西勳科長任內推動的計畫，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邀請台灣大學歷史系吳密察副教授擔任主持人，學會的文史委員會召集人陳板與總幹事楊長鎮擔任協同主持人，並負擔整個行政推動的工作。本計畫的真正骨幹則是分布在全台灣各地的十個種籽社區——花蓮縣花蓮港鳥踏石仔（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邵團隊）、高雄美濃鎮龍肚庄（八色鳥協會）、南投縣埔里鎮愛蘭社區（展顏文化

事業工房）、台中縣龍井鄉東海村（頑石劇團）、苗栗縣獅潭溪流域（在地族群文化工作室）、新竹縣五峰鄉花園部落（梅后蔓部落文化工作群）、新竹縣竹北市六家庄（第三工作室）、台北縣中和市安邦新村（竹籬笆工作室）、台北縣石碇鄉（霧裡薛溪文化工作室）。十個團隊共同進行一個前所未有的「村史運動」。

「大家來寫村史」計畫的意義與檢討

「大家來寫村史」計畫是一個頗具實驗性的案例，由社區營造衍生出來的地方文史工作，原本就存在著極度多元的角色，而大家來寫村史則企圖以十種類型的社區（與組織）操作，實踐出村史寫作計畫的未來性與可行性：有原住民部落、福佬村落、客家社區、眷村，在山上的、海邊的，有三百年的老社區、也有剛設村半年的新社區。在區域性的分布上，從台北到高雄，從花蓮到苗栗，或許有點象徵性，卻也刻意表現多元的村史寫作之可能性。



《大家寫村史》封面

計畫主持人吳密察教授在《大家來寫村史》的「前言」中指出，

「大家來寫村史」運動，是希望將長期以來由專家、學者所進行的「歷史研究」，釋放出來由在地生活者、業餘者來「書寫歷史」。這種歷史書寫，與其說重視歷史訓練所強調的冷靜客觀，勿寧說更希望呈現當地人經驗中的喜怒哀樂和恩怨情仇。透過這種歷史書寫，提煉過往的經驗並編組記憶，讓歷史成為「自己的」，而不是與自己無關的「知識」。

「大家來寫村史」運動，也不認為歷史書寫有固定的方法與格式，甚至希望它

是始終保持在實驗、摸索、修正的狀態。也就是說，書寫的過程及其過程中的動員、交流、成長，遠比一部完成了的村史更加重要。「大家來寫村史」運動，不但沒有範本也沒有終結。[9]」

從1987年解嚴，一直到1998年，十一年間，地方文史運動已經有各式各樣的表現，從1994年到1998年，四年多以來，社區營造的工作也推動得如火如荼。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在這個階段提出來，也有結合地方文史與社區營造相之後重新出發的意味。計畫執行單位－－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就是以多元的角度介入社區、重建社區為目的的社團組織，而計畫的執行人－－全國各地十個種籽村的負責人，幾乎都是地方文史工作界的一時之選，少數幾位初次接觸地方文史的社區工作者，也在社區營造學會成立的「村史總站」（只是一個行政協調與資源引介的機制，並沒有特定的權力階級關係）邀請專業師資到社區協助（或稱為陪伴）。計畫主持人吳密察教授則是剛剛主持過《二崁地方志》的台灣史專家。而當時的台灣省政府文化處，則以全新的（也因省府虛級化即將走入歷史的）單位，在全省各地鼓吹鄉土文化的重建工作。大家因緣際會相遇在一起，對每個即將發生、即將操作的「村史運動計畫」都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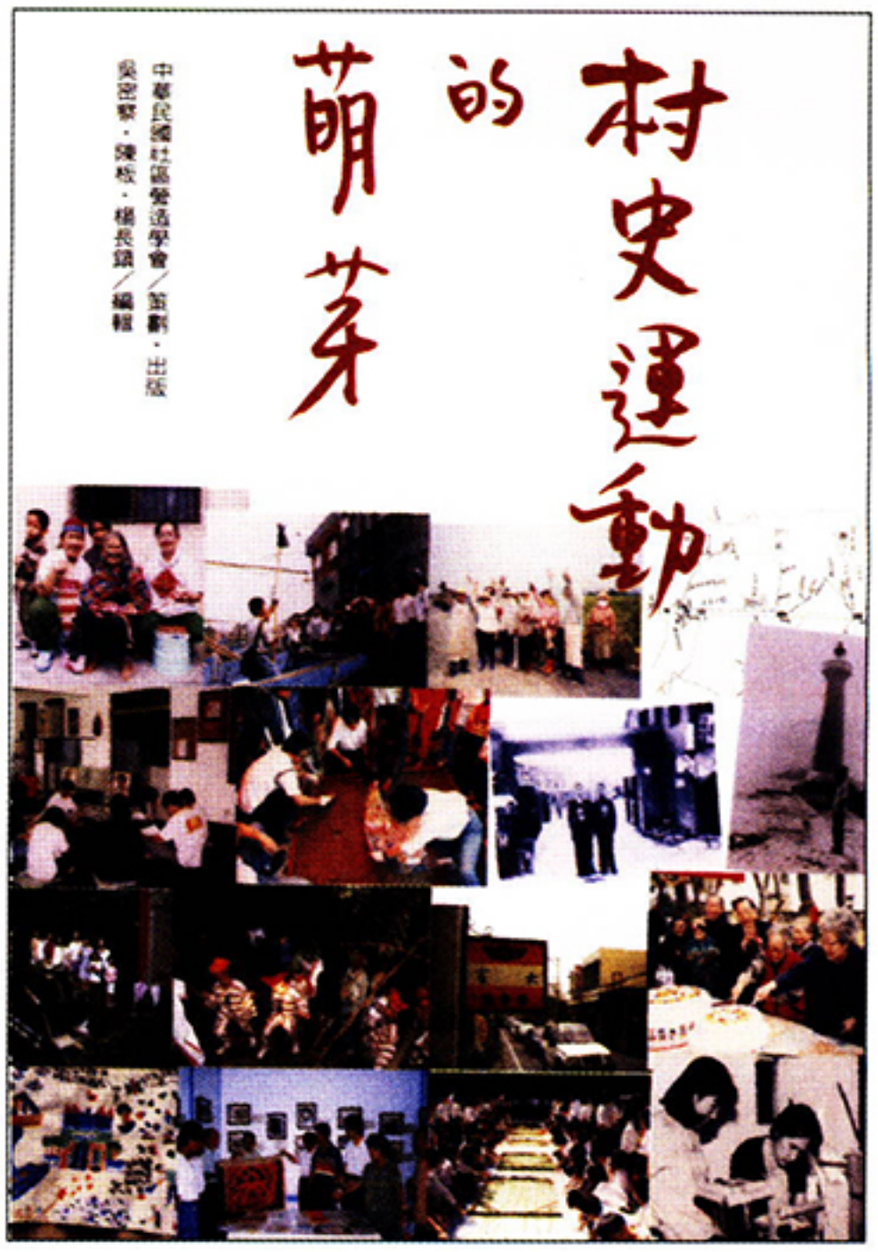
「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在討論過程中曾經想以「村史運動」為題，後因限於公部門的經費思維，改變名稱，然而，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參與式的運動基調仍然貫串整個計畫。

執行了一年多之後，計畫暫時告一個段落，文化處轉型成為文建會中部辦公室，也將每個種籽村的初步成果摘要出版了《村史運動的萌芽》[10]，再次修正

9 陳板主編，《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操作手冊》，（台北市：唐山出版社、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1998年12月初板/2001年6月修訂再板。頁10-11。

10 吳密察、陳板、楊長鎮編輯，《村史運動的萌芽》，（台北市：唐山出版社、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1999年12月。

了「大家來寫村史」的構想，首先，仍然把「村史運動」當成未來的操作指標，同時，經過種籽村與學者專家的多次溝通、論辯之後，也重新拆解了「大家來寫村史」的意義為「大家，來，寫，村史」。解構之後的「大家來寫村史」，大家，是指參與者面向的多元性；來，是一種意願；寫，則擴大成一種多元操作的運動，而且不僅僅侷限於文字書寫；村史，已經不只是地方文史，而是一種集體又個別的人文重建工程。



《村史運動的萌芽》封面

操作的方式與檢討

在計畫執行之初，種籽村與村史總站曾經提出若干可能的操作方式：口述歷史、地景踏勘導覽、文化地圖、村史博物館的設置、家族收藏展的舉辦、傳統產業操作、影像蒐集、紀錄片拍攝與製作、邵族正名運動、社區劇場、眷村改建記事、工作坊與村史記者等。經過一年多的執行，大部分的方式都獲得深化或實踐。

花蓮港的烏踏石仔的村史寫作，是在一個在1963年因為花蓮港的設置逐漸消失的小漁村的村史重建計畫。黑潮文教基金會從尋找散落在各地的村民開始，做村史田野調查，再展現初步的田野成果，繼而找尋更多的村民，最後才製作村史手冊、錄影帶，鼓舞一個已消失的小漁村公開討論未來之展望。黑潮文教基金會在計畫結束時出版了一本小巧可人的小書－－《與白燈塔一起消失的漁村



《烏踏石仔：海洋鄉土教材》，黑潮文教基金會在花蓮港操作村史運動的成果之一。

——烏踏石仔【海洋鄉土教材】》[11]，替他們的成果找到一個新的開始。

美濃八色鳥協會透過書寫《大家來寫龍肚庄誌》[12]，整合了離鄉大專青年與在地耆老，形成了非常在地的地方文史志書。擔任計畫執行人的八色鳥協會專案助理洪馨蘭認為「書寫，不只是為了真實性，重要的是它的意義」，八色鳥參與成員透過小型的採訪、讀書會、文獻整理、原始資料整理、謄抄錄音帶還有整理相片的操作過程，出版了龍肚第一本庄志——《大家來寫龍肚庄誌》。他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操作手法，鼓舞其他村莊書寫《中壇庄誌》或《竹頭腳庄誌》。也在書寫的過程中找尋在地的、大專青年參與的、耆老可以發揮的在地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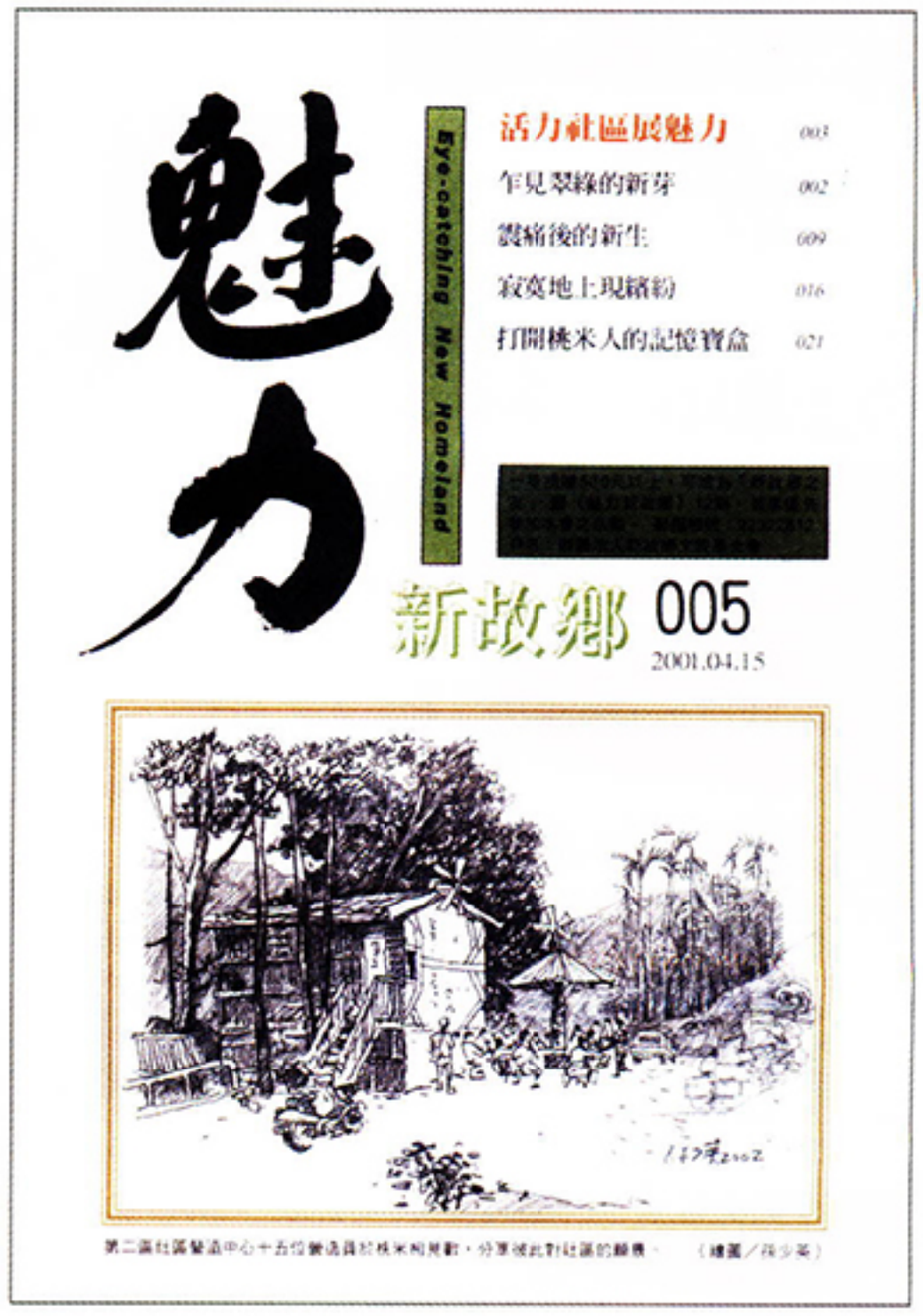
日月潭的邵團隊從邵族正名運動出發，將計畫定位在「以邵族為主體的社區運動」。邵團隊的簡史朗老師表示，「本計畫希望透過社區居民參與的方式，使村人有機會回顧歷史的過往，並檢視目前面臨的處境，重新認識邵族文化的精髓，重建族人自我認同的信心，並以社區總體營造和生命共同體的觀點，促進村中邵人和漢人之間相知、互信和互助的精神。」邵團隊在簡史朗、理事長巴

11 黑潮文教基金會，《與白燈塔一起消失的漁村——烏踏石仔【海洋鄉土教材】》，（花蓮縣：財團法人黑潮文教基金會），2001年3月。

12 美濃八色鳥協會，《大家來寫龍肚庄誌》。文建會中部辦公室。1999。

努・佳巴暮暮與白宏如老師的努力之下，首先成立了邵族有史以來第一個獲得官方認可的組織「南投縣魚池鄉邵族文化發協會」，成為具有法人資格的社團組織。921 讓日月村幾乎全毀，當時就是透過這個法定組織爭取到不少救難物資，不只協助邵族度過難關，也讓日月村漢人朋友共享資源。

埔里愛蘭台地上，展顏文化工坊從孩子出發，愛蘭國小的小朋友在愛蘭造紙師傅的指導之下從事「鴨母被」的製作，把在地產業與集體農業記憶從小孩子的遊戲過程掀開來了。展顏文化工坊林琮盛表示，「我們選擇先透過密集的、深度的田野調查，貼近一個個愛蘭人的生命史，去尋找、勾起那種被經濟壓力和時間磨滅殆盡的隱約土地情感，與族群技藝，也在這裡急速凋零的文化遺產，做最後一道關卡的搶救。」以報導文學的筆觸記錄歷史，是展顏文化工坊的特長，負責人廖嘉展、顏新珠夫婦出身《人間雜誌》，當時還替社區營造學會主編《新故鄉雜誌》。展顏文化工坊的努力，鼓舞了愛蘭人從最切身的現實經濟脫困而出，犧牲假期編寫鄉土教材、八十七歲高齡的巴宰族（Pazeh）後裔因此許諾用盡生命最後的光與熱投入母語的整體使命中。



《魅力新故鄉雜誌》封面，為921之後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發行的重建刊物。

著名的台中理想國社區，是建商炒作起來的知名觀光景點，卻也是剛成立半年的東海村新社區。當時設在村內的頑石劇團，企圖結合社區劇場與村史寫作，重塑東海村史。他們的操作模式為：舉辦村史說明會，開辦三天的「村史寫作工作坊」，進行田野調查，製作導覽地圖介紹店家景觀特色，舉辦兒童戲劇與村史劇之表演，發行刊物與記錄片製作。探討在商業與生活的互動過程中，

昔日著名的理想國商圈如何成為未來理想的居住村落。

苗栗獅潭村，計畫設定成立「獅潭村史博物館」，在地族群文化工作室利用負責人楊長鎮的閒置老家當作未來博物館的設置地點，從「大家來畫文化地圖」開始，挖掘老少獅潭人對地方的記憶地圖。在地族群文化工作室放棄懸掛紅布條、邀請地方首長的制式機制，而以許許多多非正式的活動展開。其操作模式為：村史工作坊（留鄉青年的村史討論會）、社區大事週記（由獅潭國中擔任記錄人）、大家來做家族史（推動以家庭聯絡簿為媒介喚醒國中小學生的家族記憶），最後才是「打逗敘」的村史博物館之設置，由村民合作策劃、收集、佈置、解說的村史文物館，當作村史運動的階段成果。

新竹縣梅后蔓部落，是泰雅族為主體，混有少數賽夏族與客家族的社區，幅員遼闊的梅后蔓（行政名稱為花園村），分為河頭部落、上比來部落、下比來部落、花園第一鄰、花園第二鄰與天湖部落進行。由梅后蔓文史工作室召集小組會議，確定「部落村史運動」工作夥伴開始，一次又一次召開小組會議，擬定全年的計畫，分派給每個組員的任務是「多聽、多記錄、多學習，並用心、身體來融入原住民的文化領域。」梅后蔓文史工作室更「從最小的層面開始逐戶拜訪，在每鄰、每戶舉辦文史運動說明會」，深入到每家每戶的文史運動，大概是梅后蔓最令人感動的操作方式了。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庄，是第三工作室的所在地，目前經歷到幾個國家重大計畫，將讓原先的客家農民生活完全扭轉，成為新竹縣縣治第二期都市計畫區與高鐵新竹車站特定區，屆時，連鄉土教學都將喪失了現場。第三工作室從社區尋寶開始，鼓勵六家國中、六家國小師生共同參與到鄉土知識與鄉土資料的建構工作。一方面也持續長期進行的記錄片工作，還鼓吹社區媽媽照相記者的操作，讓參與者擴大到社區既有的組織中。

台北縣石碇鄉是一個美麗的「山街」，卻可能因為北二高聯絡道路與北宜高速公路的經過，喪失其原始感人的地理形貌。由華梵大學師生組成的霧裡薛溪文化工作室，為挽救山街特色寧靜小鎮而成立工作室。工作室除了以在地學院

身分持續進行空間歷史的累積與日常的社區串聯外，在當地推出「石碇溪流環境圖繪全鄉巡迴展」、古道踏勘與鄉慶。透過空間專業者與在地居民的互動，著重「行動式歷史所具有的地方社區重建的作用」，企圖進一步推動對石碇溪流域社會空間的歷史改造。

台北縣中和的安邦新村是一個即將改建的「國家安全局」眷村，竹籬笆工作室掌握了改建所可能面臨的記憶流失情境，鼓舞社區居民投身新村歷史的書寫。其操作過程為：在社區文史方面有老照片蒐集、二十八週年村慶饗宴、安邦人寫安邦事徵稿活動以及針對人、事、物的口述訪問。在社區生活與環保活動方面有社區教室（主婦聯盟環境保育基金會介紹綠色消費等）、社區生態步道、大地遊戲及環保DIY。在眷村的改建方面則以蒐集改建資料為主。台灣的眷村是世界少見的人類遺產，安邦新村的記錄應該能切身的掌握到歷史竹籬笆的遺痕。

每個社區的操作方式，幾乎都不同，雖然從執行的過程而言各有異趣，然而，幾乎所有的社區都以社區的重建，以及社區的未來性考量當成個別的地方文史寫作標的。

操作的目的

社區營造幾乎可說是十個種籽村的共同目標，可是，個別地說，每個社區仍有自己的階段性目的，幾乎所有的社區都努力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操作模式，可是，村史的寫作卻是一個必須長時間經營的永續工程，而且也無法與社區硬體工程與經營切割得開，因此，必須找到一個社區能夠提供資源的機制（或者從不同政府部門找到經費支援的可能性）比找尋短暫的公部門補助機制更為重要。

大家來寫村史，是一個集體功課，和個人從事的文史寫作有相當大的差異性，因此，如何建立一個既能進入社區又能永續經營的操作方式，才可能達成目的。也因此，它必須與社區營造相互為用，在社區營造中注入地方文史，也在

地方文史操作過程設想社區營造。

到目前為止，十個種籽村仍然憑著個別的努力找尋不同的資源繼續寫下去，從某個角度來看，能夠繼續寫下去，就是大家來寫村史的操作目的。

操作成果的檢討

從表面上的成果來看，幾本書的出版加上十本厚厚的報告，勉強可稱得上是符合了計畫的原初要求，但，單單是這樣的「成果」並無法滿足每個種籽村的內在動力。

本計畫除了在每個社區推動之外，還在網路上、媒體上不斷對內也對外連結，企圖創造一個不斷運動的操作方式，可惜，計畫時程結束之後雖仍有不少人進入大家來寫村史的網頁[13]，但後續的維護卻因為諸種因素無法持續。雖然如此，計畫執行了一段時間之後，就已經有不少社區有跟進的意願，然而，限於操作上的經費，這樣的延伸可能性並無法全面普及，不過，換個角度想，不同的社區有不同的進度、不同的操作模式與不同程度的操作經驗，也是多元寫作的樂趣。

一個意外的成果發生在世紀大地震921之後發生，十個種籽村中竟有兩個（愛蘭社區與日月潭邵族）不幸就在震災區內。當時大家來寫村史的計畫剛剛告一個段落，有些社區想找不同的延續方式，有些想轉型更積極切入社區營造，而邵族剛剛成立了「邵族文化發展協會」，中秋節是邵族的過年，慶典正在進行，新任理事長巴努也剛剛獲得社區的信任，接下從父親繼承而來的祭司（農曆八月初一〔新曆九月十日〕接任首席祭司）身分，沒想到無情的地震就在11天後的半夜來臨。幸好，有一個剛剛通過的「邵族文化發展協會」，在震災之後的復建工作中發揮了相當大的效用，一方面透過這個新組織，一方面也是先前

13 參閱http://www.south.nsysu.edu.tw/mstories/ 台灣文史網--**大家來寫村史**。

凝聚起來的共識，讓還沒獲得原住民身分認定（也就無法獲得原民會的資源）的邵族，獲得了臨時安置的組合屋計畫所需要的1000萬新台幣的民間捐款（500萬來自中研院的捐款、500萬來自新竹市政府與民間社團的捐款）。

相對於其他災區，這樣的幸運應非偶然，而是來自於透過邵族村史寫作計畫的擾動，重新凝聚了邵族人的民族與社區意識，也在重建的過程有不只是工程進行上的超快進度，還在品質的呈現上充滿了未來性。

而愛蘭台地的社區，也因先前埔里的社區長期經營與展顏文化工坊的村史寫作計畫，有機會在重建時考慮到文化的品質。



六家庄番子寮大水汴（舊影）：獲得高鐵都市計畫保留的客家農耕文化設施之一，未來將成為社區公園，請注意週遭的建築物已遭都市計畫拆除。



六家庄番子寮鳥瞰（舊影）：如今只剩下一座老屋獲得保存（圖中後方的四知堂楊屋），其餘的地景均已遭推土機推平。

七、文史工作的未來

地方文史工作在台灣的經驗，應該是一項空前的文化運動，截至目前為止，雖然已經漸漸從社會的邊緣思維轉變成社區營造的必要「項目」，然而，從社會整體的需求而言仍有一大段路要走。

廣義的地方文史工作室雖然可能已經超過兩千的單位，可是真正有動能的恐怕不及百分之一，而全國各地荒廢了數百年文史思維的社區，還不知道有多少完全沒有進入狀況，再加上文史工作者的確也在專業能力上有不同的程度，因此，文史工作的未來，雖然樂觀卻也有危險性。

自覺的社區

地方文史能不能成為社區（營造）的思維，端賴社區有沒有自覺，而社區的自覺又不單是社區自身所能引爆。美濃的青年回鄉，應當是一個相當具有啟發性的引爆方式，透過大專青年寒暑假的回鄉寫村史，一方面讓一上大學就遠離（如果沒有特別安排很可能一輩子都不回或回不了）社區的年輕人親近自己的家鄉，踏上家鄉的泥土，再依靠社區歷史的引發，另一方面也讓社區的耆老開啟生命的第二春。

近年來，公部門一反過去對鄉土的打壓或冷淡，積極地投身鄉土的投資，尤其在人才培訓方面，相當令人肯定。雖然在操作手法上仍有進步的空間，然而，整體的方向卻可期待。

今年度才開始的社區營造中心、社區營造點與社區營造員的培訓機制，打開了另一扇窗口，進一步啟發了過去一向難以動員的傳統社區發展協會的社區文史意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當成內爆社區自覺的機制。在未來，如何將這樣的機制去除其莫名的階層關係、擴大參與的可能性、增加縣市層級（甚至是鄉鎮市層級）的認知以及在公部門的橫向聯繫的暢通度，如是，亦可因此加速或擴大社區的文史自覺力。

有歷史觀點的社區

從地方文史切入，不只是一個介面，也是提供一個觀點，社區的今天是明天的歷史，而社區的未來，也無法脫離今天的願景思維。行政院推動的挑戰2008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其中作為總體指標的「觀光客倍增計畫」，一旦成為國人的期許，那麼令人擔憂的不只是社區準備了什麼給倍增的觀光客？還可能因觀光客之倍增，急忙搶錢，而損毀了社區文史。

如今的北埔，雖然早在1994年就成為第一個進入社區總體營造操作的社區案例，期間也有推動得相當令人讚賞的產業文化節（北埔膨風節），也塑造了以歷史古蹟為主題訴求的社區旅遊機制，然而，每到週休二日就有至少200輛以上的遊覽車開來，已經讓北埔大感吃不消，觀光客倍增之後，每個例假日有超過400輛遊覽車的觀光客湧入，以目前的承載規模，北埔更不知如何因應了？

在社區營造、地方文史與客觀現實的觀光客倍增的交錯考量之後，生活的品質，是否有機會成為動態的歷史觀點的考量基礎呢？

永續發展的社區

社區的發展，無庸置疑每個社區居民都能理解，可是永續發展的社區就需要更深入的思索了。地方文史的思維介入社區，雖然不能保證社區的永續性，卻是社區不能不面對的課題。而，社區的永續發展，同時也將是台灣地方文史工作者必須時時刻刻不能迴避的理念吧。（2002/10/10初稿）